



国家出版基金项目
NATIONAL PUBLICATION FOUNDATION

中国近代
思想家文库



杨琥
编

李大钊卷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国家出版基金项目
NATIONAL PUBLICATION FUND PROJECT

中国近代
思想家文库



杨琥
编

李大钊卷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 北京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中国近代思想家文库. 李大钊卷/杨琥编.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4. 7

ISBN 978-7-300-19659-6

I. ①中… II. ①杨… III. ①思想史-研究-中国-近代②李大钊 (1889~1927)-思想评论 IV. ①B250.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4) 第 148321 号



中国近代思想家文库

李大钊卷

杨琥 编

Li Dazhao Juan

出版发行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中关村大街 31 号	邮政编码	100080
电 话	010-62511242 (总编室)		010-62511770 (质管部)
	010-82501766 (邮购部)		010-62514148 (门市部)
	010-62515195 (发行公司)		010-62515275 (盗版举报)
网 址	http://www.crup.com.cn		
	http://www.ttrnet.com (人大教研网)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涿州市星河印刷有限公司		
规 格	160 mm×230 mm 16 开本	版 次	2014 年 7 月第 1 版
印 张	34 插页 2	印 次	2014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字 数	546 000	定 价	77.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

《中国近代思想家文库》编纂委员会名单

主 任 柳斌杰 纪宝成
副主任 吴尚之 李宝中 李 潞
 王 然 贺耀敏 李永强

主 编 戴 逸
副主编 王俊义 耿云志
委 员 王汝丰 刘志琴 许纪霖 杨天石 杨宗元
 陈 铮 欧阳哲生 罗志田 夏晓虹 徐 莉
 黄兴涛 黄爱平 蔡乐苏 熊月之
(按姓氏笔画排序)

总 序

对于近代的理解，虽不见得所有人都是一致的，但总的说来，对于近代这个词所涵的基本意义，人们还是有共识的。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走入近代，就意味着以工业化为主导的经济取代了以地主经济、领主经济或自然经济为主导的中世纪的经济形态，也还意味着，它不再是孤立的或是封闭与半封闭的，而是以某种形式加入到世界总的发展进程。尤其重要的是，它以某种形式的民主制度取代君主专制或其他不同形式的专制制度。中国是个幅员广大、人口众多、历史悠久的多民族国家，由于长期历史发展是自成一体的，与外界的交往比较有限，其生产方式的代谢迟缓了一些。如果说，世界的近代是从17世纪开始的，那么中国的近代则是从19世纪中期才开始的。现在国内学界比较一致的认识，是把1840年到1949年视为中国的近代。

中国的近代起始的标志是1840年的鸦片战争。原来相对封闭的国门被拥有近代种种优势的英帝国以军舰、大炮再加上种种卑鄙的欺诈打开了。从此，中国不情愿地加入到世界秩序中，沦为半殖民地。原来独立的大一统的中央集权的君主专制国家，如今独立已经极大地被限制，大一统也逐渐残缺不全，中央集权因列强的侵夺也不完全名实相符了。后来因太平天国运动，地方军政势力崛起，形成内轻外重的形势，也使中央集权被弱化。经历第二次鸦片战争、中法战争、甲午战争、八国联军入侵的战争以及辛亥革命后的多次内外战争，直至日本全面侵略中国的战争，致使中国的经济、政治、教育、文化，都无法顺利走上近代发展的轨道。古今之间，新旧之间，中外之间，混杂、矛盾、冲突。总之，鸦片战争后的中国，既未能成为近代国家，更不能维持原有的统治秩序。而外患内忧咄咄逼人，人们都有某种程度“国将不国”的忧虑。

“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读书明理的士大夫，或今所谓知识分子，

尤为敏感，在空前的危机与挑战面前，皆思有所献替。于是发生种种救亡图存的思想与主张。有的从所能见及的西方国家发展的经验中借鉴某些东西，形成自己的改革方案；有的从历史回忆中拾取某些智慧，形成某种民族复兴的设想；有的则力图把西方的和中国所固有的一些东西加以调和或结合，形成某种救亡图强的主张。这些方案、设想、主张，从世界上“最先进的”，到“最落后的”，几乎样样都有。就提出这些方案、设想、主张者的初衷而言，绝大多数都含着几分救国的意愿。其先进与落后，是否可行，能否成功，尽可充分讨论，但可不必过为诛心之论。显而易见，既然救国的问题最为紧迫，人们所心营目注者自然是种种与救国的方案直接相关的思想学说，而作为产生这些学说的更基础性的理论，及其他各种知识、思想，则关注者少。

围绕着救国、强国的大议题，知识精英们参考世界上种种思想学说，加以研究、选择，认为其中比较适用的思想学说，拿来向国人宣传，并赢得一部分人的认可。于是互相推引，互相激励，更加发挥，演而成潮。在近代中国，曾经得到比较广泛的传播的思想学说，或者够得上思潮的，主要有以下几种：

（一）进化论。近代西方思想较早被引介到中国，而又发生绝大影响的，要属进化论。中国人逐渐相信，进化是宇宙之铁则，不进化就必遭淘汰。以此思想警醒国人，颇曾有助于振作民族精神。但随后不久，社会达尔文主义伴随而来，不免发生一些负面的影响。人们对进化的了解，也存在某些片面性，有时把进化解为一条简单的直线。辩证法思想帮助人们形成内容更丰富和更加符合实际的发展观念，减少或避免片面性的进化观念的某些负面影响。

（二）民族主义。中国古代的民族主义思想，其核心是“非我族类，其心必异”，所以最重“华夷之辨”。鸦片战争前后一段时期，中国人的民族思想，大体仍是如此。后来渐渐认识到“今之夷狄，非古之夷狄”，“西人治国有法度，不得以古旧之夷狄视之”。但当时中国正遭受西方列强的侵略和掠夺，追求民族独立是民族主义之第一义。20世纪初，中国知识精英开始有了“中华民族”的概念。于是，渐渐形成以建立近代民族国家为核心的近代民族主义。结束清朝君主专制，创立中华民国，是这一思想的初步实现。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中国加入“协约国”，第一次以主动的姿态参与世界事务，接着俄国十月革命爆发，这两件事对近代中国的发展历程造成绝大影响。同时也将中国人的民族主义提升

到一个新的层次，即与国际主义（或世界主义）发生紧密联系。也可以说，中国人更加自觉地用世界的眼光来观察中国的问题。新生的中国共产党和改组后的国民党都是如此。民族主义成为中国的知识精英用来应对近代中国所面临的种种危机和种种挑战的一个重要的思想武器。

（三）社会主义。社会主义作为一种模糊的理想是早在古代就有的，而且不论东方和西方都曾有过。但作为近代思潮，它是于19世纪在批判近代资本主义的基础上产生的。起初仍带有空想的性质，直到马克思和恩格斯才创立起科学社会主义。20世纪初期，社会主义开始传入中国。当时的传播者不太了解科学社会主义与以往的社会主义学说的本质区别。有一部分人，明显地受到无政府主义的强烈影响，更远离科学社会主义。直到五四新文化运动兴起之后，中国人始较严格地引介、宣传科学社会主义。但有一段时间，无政府主义仍是一股很大的思想潮流。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从思想上说，是战胜无政府主义的结果。中国共产党把在中国实现社会主义乃至共产主义作为自己的奋斗目标。此后，社会主义者，多次同各种非科学社会主义思想的信仰者进行论争并不断克服种种非科学社会主义思想的影响。

（四）自由主义。自由主义也是从清末就被介绍到中国来，只是信从者一直寥寥。直到五四新文化运动兴起，具有欧美教育背景的知识精英的数量渐渐多起来，自由主义始渐渐形成一股思想潮流。自由主义强调个性解放、意志自由和自己承担责任，在政治上反对一切专制主义。在中国的社会条件下，自由主义缺乏社会基础。在政治激烈动荡的时候，自由主义者很难凝聚成一股有组织的力量；在稍稍平和的时候，他们往往更多沉浸在自己的专业中。所以，在中国近代史上，自由主义不曾有，也不可能有很大的作为。

（五）激进主义与保守主义。处于转型期的社会，旧的东西尚未完全退出舞台，新的东西也还未能巩固地树立起来，新旧冲突往往要持续很长的时间，有时甚至达到很激烈的程度。凡助推新东西成长的，人们便视为进步的；凡帮助旧东西排斥新东西的，人们便视为保守的。其实，与保守主义对应的，应是进步主义；与顽固主义相对的则应是激进主义。不过在通常话语环境中人们不太严格加以区分。中国历史悠久，特别是君主专制制度持续两千余年，旧东西积累异常丰富，社会转型极其不易。而世界的发展却进步甚速。中国的一部分精英分子往往特别急切地想改造中国社会，总想找出最厉害的手段，选一条最捷近的路，以

最快的速度实现全盘改造。这类思想、主张及其采取的行动，皆属激进主义。在中共党史上，它表现为“左”倾或极左的机会主义。从极端的激进主义到极端的顽固主义，中间有着各种程度的进步与保守的流派。社会的稳定，或社会和平改革的成功，都依赖有一个实力雄厚的中间力量。但因种种原因，中国社会的中间力量一直未能成长到足够的程度。进步主义与保守主义，以及激进主义与顽固主义，不断进行斗争，而实际所获进步不大。

（六）革命与和平改革。中国近代史上，革命运动与和平改革运动交替进行，有时又是平行发展。两者的宗旨都是为改变原有的君主专制制度而代之以某种形式的近代民主制度。有很长一个时期，有两种错误的观念，一是把革命理解为仅仅是指以暴力取得政权的行动，二是与此相关联，把暴力革命与和平改革对立起来，认为革命是推动历史进步的，而改革是维护旧有统治秩序的。这两种论调既无理论根据，也不合历史实际。凡是有助于改变君主专制制度的探索，无论暴力的或和平的改革都是应予肯定的。

中国近代揭幕之时，西方列强正在疯狂地侵略与掠夺殖民地和半殖民地，中国是它们互相争夺的最后一块、也是最大的资源地。而这时的中国，沿袭了两千年的君主专制制度已到了奄奄一息的末日，统治当局腐朽无能，对外不足以御侮，对内不足以言治，其统治的合法性和统治的能力均招致怀疑。革命运动与改革的呼声，以及自发的民变接连不断。国家、民族的命运真的到了千钧一发之际，危机极端紧迫。先觉分子救国之心切，每遇稍具新意义的思想学说便急不可待地学习引介。于是西方思想学说纷纷涌进中国，各阶层、各领域，凡能读书读报者，受其影响，各依其家庭、职业、教育之不同背景而选择自以为不错的一种，接受之，信仰之，传播之。于是西方几百年里相继风行的思想学说，在短时期内纷纷涌进中国。在清末最后的十几年里是这样，五四时期在较高的水准上重复出现这种情况。

这种情况直接造成两个重要的历史现象：一个是中国社会的实际代谢过程（亦即社会转型过程）相对迟缓，而思想的代谢过程却来得格外神速。另一个是在西方原是差不多三百年的历史中渐次出现的各种思想学说，集中在几年或十几年的时间里狂泻而来，人们不及深入研究、审慎抉择，便匆忙引介、传播，引介者、传播者、听闻者，都难免有些消化不良。其实，这种情况在清末，在五四时期，都已有人觉察。我们现

在指出这些问题并非苛求前人，而是要引为教训。

同时我们也看到，中国近代思想无比的多样性与复杂性呈现出绚丽多彩的姿态，各种思想持续不断地展开论争，这又构成中国近代思想史的一个突出特点。有些论争为我们留下了非常丰富的思想资料。如兴洋务与反洋务之争，变法与反变法之争，革命与改良之争，共和与立宪之争，东西文化之争，文言与白话之争，新旧伦理之争，科学与人生观之争，中国社会性质的论争，社会史的论争，人权与约法之争，全盘西化与本位文化之争，民主与独裁之争，等等。这些争论都不同程度地关联着一直影响甚至困扰着中国人的几个核心问题，即所谓中西问题、古今问题与心物关系问题。

中国近代思想的光谱虽比较齐全，但各种思想的存在状态及其影响力是很不平衡的。有些思想信从者多，言论著作亦多，且略成系统；有些可能只有很少的人做过介绍或略加研究；有的还可能因种种原因，只存在私人载记中，当时未及面世。然这些思想，其中有很多并不因时间久远而失去其价值。因为就总的情况说，我们还没有完成社会的近代转型，所以先贤们对某些问题的思考，在今天对我们仍有参考借鉴的价值。我们编辑这套《中国近代思想家文库》，希望尽可能全面地、系统地整理出近代中国思想家的思想成果，一则借以保存这份珍贵遗产，再则为研究思想史提供方便，三则为有心于中国思想文化建设者提供参考借鉴的便利。

考虑到中国近代思想的上述诸特点，我们编辑本《文库》时，对于思想家不取太严格的界定，凡在某一学科、某一领域，有其独立思考、提出特别见解和主张者，都尽量收入。虽然其中有些主张与表述有时代和个人的局限，但为反映近代思想发展的轨迹，以供今人参考，我们亦保留其原貌。所以本《文库》实为“中国近代思想集成”。

本《文库》入选的思想家，主要是活跃在1840年至1949年之间的思想人物。但中共领袖人物，因有较为丰富的研究著述，本《文库》则未收入。

编辑如此规模的《文库》，对象范围的确定，材料的搜集，版本的比勘，体例的斟酌，在在皆非易事。限于我们的水平，容有瑕疵，敬请方家指正。

导 言

李大钊，原名耆年，字寿昌，后改名大钊，字守常，1889年10月29日生于直隶乐亭县（今属河北省）大黑坨村。七岁起在私塾读书，1905年入永平府中学，1907年入天津北洋法政专门学校。青年时代，目睹在帝国主义侵略下的国家危亡局势和社会黑暗状况，激发了爱国热忱，立志要为苦难的中国寻求出路。1913年，东渡日本，就读于东京早稻田大学。在日本向中国袁世凯政府提出“二十一条”亡国条件后，参加中国留日学生总会的爱国斗争，向国内寄发《警告全国父老书》。1916年5月回国后，任北京《晨钟》报编辑主任、《甲寅日刊》编辑，积极参与正在兴起的新文化运动。1917年12月至北京大学工作，1918年1月担任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后兼任政治学系、史学系教授，参加《新青年》杂志编辑部。1918年12月，与陈独秀创办《每周评论》，介绍一战结束之后兴起的世界新思潮——社会主义。

1920年3月，李大钊指导北京大学进步学生邓中夏、高尚德、何孟雄、黄日葵、罗章龙等19人秘密发起成立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1920年初，他与陈独秀探讨了创建中国共产党组织的问题。1920年8月，在共产国际的帮助下，陈独秀在上海创建中国共产党第一个党组织。10月，李大钊在北京发起建立了北京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后，李大钊任中共北京地方委员会书记兼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北方区分部主任，负责领导党在北方地区的全面工作。

1922年8月底，李大钊参加了中共中央在杭州西湖举行的特别会议。1923年6月，他出席了在广州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积极参与了党的统一战线策略方针的制定。此后，李大钊多次会晤孙中山，商讨国共合作问题。同年10月，李大钊应孙中山电邀再赴上海，讨论并直接参与了国民党改组的筹备工作。

1924年1月20日，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正式开幕。李大钊为大会主席团五人成员之一。此外，他还担任大会宣言审查委员会委员、国民党章程草案审查委员会委员、出版及宣传审查委员会委员等职，参与了大会各项主要文件的审定。会上，李大钊当选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

1924年国共合作统一战线成立后，李大钊除继续领导中共北方区的工作之外，还负责国民党中央北京执行部工作，领导北方地区国共两党的革命斗争，以策应北伐战争的胜利进行。1927年4月6日，李大钊被奉系军阀张作霖逮捕，4月28日，英勇就义。

二

在中国近代史上，李大钊是一个具有特殊历史意义的人物。他的时间仅仅38年，但他跨越了中国近代史上的几个重要的历史时期。他开始探索救国救民道路的时候，仅仅是天津北洋法政学校的一名青年学生，他交往的师友主要是北洋法政学会的成员，他的思想也主要受清末康梁维新派和立宪派的影响，与当时已经兴起的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派及其主张尚有一定距离。可以说，他思想的起点并不高，主客观条件又很不利，但他锲而不舍，一往无前，冲破重重艰难险阻，一步一步地越过曾经走在他前面的同时代人，勇敢地站到了新的历史潮流的最前列，亲手揭开了中国革命史的新篇章。他不愧是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先驱和最早的马克思主义者。

李大钊从一个爱国青年成长为我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先驱和最早的马克思主义者，毫无疑问，主要是由近代中国的社会、历史条件 and 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等时代环境决定的。但从思想史的角度来考察，除了诸种客观原因以外，李大钊的思想特点、人格品质和精神素质起了相当重要的作用。综观李大钊短暂的一生，他身上具有一般历史人物不可比拟的思想特点和精神素质。这主要体现在：

1. 忠贞爱国的情怀，提倡新爱国主义

李大钊生活在内忧外患、灾难深重的近代中国，自他步入社会起，即以救国救民、民族振兴为职志：“感于国势之威迫，急思深研政理，求得挽救民族、振奋国群之良策。”（《狱中自述》，本导言凡引用李大钊语，均收入本书，故只注篇名，具体页码省略。）而李大钊的这一特点，在他与陈独秀关于“爱国心”与“自觉心”的论争中非常鲜明地反映出来。

这场关于“爱国心”与“自觉心”的讨论，是由陈独秀引发的。1914年11月，针对“二次革命”后袁世凯实行的名为共和、实为专制的专制统治，陈独秀在《甲寅杂志》上发表《爱国心与自觉心》一文，提出“爱国心与自觉心”的问题。陈独秀说：“国人无爱国心者，其国恒亡。国人无自觉心者，其国亦殆。二者俱无，国不必国。”他尖锐地指出：“国家者，保障人民之权利，谋人民之幸福者也。不此之务，其国也存之无所荣，亡之无所惜。若中国之为国，外无以御侮，内无以保民，且适以残民。”国家本应是保护人民自由权利、增进个人自由幸福的工具，而中国的实际情形则是，国家为专制者所把持，成了他们残民以逞的工具，这样的国家值不值得人民去爱呢？他认为：“保民之国家，爱之宜也；残民之国家，爱之也何居？”愤激之余，他说中国只有听任亡国瓜分的命运：“立国既有所难能，亡国自在所不免，瓜分之局，事实所趋”，“海外之师至，吾民必且有垂涕而迎之矣”。他以激烈的态度宣称：“穷究中国之国势人心，瓜分之局，何法可逃？亡国为奴，何事可怖？”“国家国家，尔行尔法，吾人诚无之不为忧，有之不为喜。”（陈独秀《爱国心与自觉心》，载《甲寅杂志》第1卷第4号，1914年11月10日）

陈独秀《爱国心与自觉心》一文的主旨，本意是呼吁人们对个人自由权利的自觉，呼吁人们爱国应以对国家目的的自觉为前提。但“瓜分之局，何法可逃？亡国为奴，何事可怖？”的说法则又失之偏激、悲观，而“有国不如无国”说法的流行更表明了人们在自觉之后的彷徨心情，因此，这篇文章发表以后，招致许多误解与批评。经过半年的思考，李大钊撰写了《厌世心与自觉心》一文，进一步从理论与现实两方面探讨了爱国心与自觉心的问题，把近代以来中国人对国家与个人的关系的认识提高到了一个新的层次。

首先，李大钊说，陈独秀的文章，“厌世之辞，嫌其泰多；自觉之

义，嫌其泰少”。因此，他的立论主要针对陈独秀文中的不足而进行阐发。李大钊指出，要求爱国应当以对国家目的的自觉为前提，是要人们认识到不能保护自己权利的国家没有存在的价值，目的是要人们造一可爱之国而爱之，并不是要人们不爱国，更不是使人们自甘亡国。对中国人来说，真正的自觉，不仅仅是对国家目的的自觉，而应当是：“改进立国之精神，求一可爱之国家而爱之，不宜因其国家之不足爱，遂致断念于国家而不爱。更不宜以吾民从未享有可爱之国家，遂乃自暴自弃，以侔于无国之民，自居为无建可爱之国之能力者也。”李大钊提出要“求一可爱之国家而爱之”，那么，如何才能求到一可爱国家呢？

李大钊指出：“吾民今日之责，一面宜自觉近世国家之真意义，而改进其本质，使之确足福民而不损民。民之于国，斯为甘心之爱，不为违情之爱。一面宜自觉近世公民之新精神，勿谓所逢情势，绝无可为，乐利之境，陈于吾前，苟有为者，当能立致，惟奋其精诚之所至以求之，慎勿灰冷自放也。”（《厌世心与自觉心》，载《甲寅杂志》第1卷第8号）所谓“近世公民之新精神”，就是“本自由意志之理，进而努力，发展向上”，以发扬“我”之“良知良能”，“尽我天职”，而“致国家于善良可爱之域”。即培育个人人格的独立与自觉，改造专制国家为民主共和国家。反过来说，只有尽其在我，才能承担起挽救民族、重建民族国家的任务。由此可见，李大钊所谓自觉，不仅仅是对个人自由权利的自觉，而且也包括对个体独立人格精神与自我意识的自觉。

从关于“爱国心与自觉心”的讨论中可以看出，李大钊继承了中国传统的以天下为己任的担当精神和爱国主义，又受到了近代西方民主主义和自由主义等学说的影响，提出了个体独立人格基础之上的新爱国主义。从他后来的表现可以看出，终其一生，李大钊都保持了这种精神和情怀。

2. 全球政治与世界文化的眼光，追踪世界新思潮

李大钊是近代中国具有全球政治头脑和世界文化眼光的代表人物。他生活的时代，是中国与世界的联系越来越密切的时代，国际、国内问题互相纠缠、互相影响、互相渗透。一方面，世界局势的变动迅速而深刻地影响到中国政治、经济形势的变动，世界主要国家的语言、文化、思想通过不同渠道传入中国；另一方面，中国先进的仁人志士为了救亡图存，变革自强，也密切关注世界政治、经济形势的变化，时刻追踪和学习世界思潮的最新演变，以因应世界潮流，寻求使中华民族走向国家

独立、民族振兴的真理与道路。作为这群仁人志士代表人物之一的李大钊，在他初登历史舞台开始成长之际，国际上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影响着远东局势的变化；国内袁世凯逐渐暴露出复辟帝制的野心，引起反袁护国战争。这一系列重大事件的发生，促使寻求救国救民之路的青年李大钊，将中国国内的问题与世界局势的变化联系在一起考察。而这种中国与世界互相影响的客观形势，以及李大钊参加反袁护国运动的实际斗争的锤炼，又使李大钊在探索和寻求中华民族的命运和出路时，更加自觉、主动地密切结合世界格局的变化、世界思潮的演变、世界发展的未来趋势等世界大势来思考这一重大问题。在此，我们以李大钊关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论述为例，说明他的这种思想特点。

1918年11月11日，持续四年之久的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这件事在中国引起很大反响。作为加入“协约国”一方参战的中国，虽未出一兵一卒，但毕竟也跻身战胜国之列。为庆祝胜利，北洋政府国务院发布通告，规定：“本月二十八日，庆祝欧战完全胜利，所有机关应放假一日。”段祺瑞在紫禁城太和殿前指挥了盛大的阅兵式。14日至16日，北京各校放假3天，庆祝“协约国”胜利。28日，北京政府各机关全天放假，而北京大学师生及各界群众一连3天，在中央公园再度举行庆祝大战胜利的讲演会。

大战胜利了，但如何认识这次大战胜利，或者说对这次大战的意义如何认识？对此，当时思想文化界的代表人物有不同的认识和答案。

在蔡元培看来，这次的战争是互助主义战胜了竞争主义；而将来的世界是“光明主义”代替“黑暗主义”（蔡元培《黑暗与光明的消长》，载《北京大学日刊》，1918年11月27日）。胡适指出：“这一次协商国所以能完全大胜，不是‘武力解决’的功效，乃是‘解决武力’的功效。”（胡适《武力解决与解决武力》，载《新青年》第5卷第6号，1918年12月）陈独秀认为，这次大战的胜利是“公理战胜强权”的结果，因此，他认为，今后的中国与东亚“对于战后的觉悟和要求，最要紧的是对外对内两件大事”：“对外的觉悟和要求，是人类平等主义，是要欧美人抛弃从来歧视颜色人种的偏见。……对内的觉悟和要求，是抛弃军国主义，不许军阀把持政权。”（陈独秀《欧战后东洋民族之觉悟及要求》，载《每周评论》第2号，1918年12月29日）

对于北洋政府的这一系列庆祝活动，对于报刊舆论对段祺瑞的颂扬，对于知识界对战后世界的乐观分析，李大钊都是看在眼里的，而究

竟如何认识第一次世界大战，认识战后世界的发展趋势，尤其是战后世界与中国的关系以及中国的前途和出路，是李大钊在大战结束前后思考的重要问题。

早在1917年，在主持《甲寅日刊》国际版时，李大钊就发表了一系列关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及中国是否参战的文章，而在俄国发生了二月革命、十月革命这两次革命以后，李大钊于1918年7月发表了《法俄革命之比较观》，更加密切关注着国际局势的变化和欧战的结局。

而此时，当欧战胜利以后，在政府、民众和大部分知识分子异口同音的欢呼声中，在中央公园召开的庆祝大会讲演会上，李大钊发表了题为《庶民的胜利》的著名演说。在这场讲演中，李大钊面对听众发出了疑问：这次战争中获胜的“究竟是那一个”？我们大家“究竟是为那个庆祝”？他的结论是：“这回战胜的，不是联合国的武力，是世界人类的新精神。不是那一国的军阀或资本家的政府，是全世界的庶民。”“我们庆祝，不是为那一国或那一国的一部分人庆祝，是为全世界的庶民庆祝。不是为打败德国人庆祝，是为打败世界的军国主义庆祝”（《庶民的胜利》）。

首先，李大钊论述了一战的社会基础，指出其爆发的真正原因是资本主义的发展、竞争与扩张，需要更加广阔的市场和组织，以掠夺其他国家的资源与市场，这种发展就促使资本之间的斗争转化为国家力量的斗争。他指出：“原来这回战争的真因，乃在资本主义的发展。国家的界限以内，不能涵容他的生产力，所以资本家的政府想靠着大战，把国家界限打破，拿自己的国家做中心，建一世界的大帝国，成一个经济组织，为自己国内资本家一阶级谋利益。”（《庶民的胜利》）他又说：“此次战争的真因，原来也是为把国家界限打破而起的。因为资本主义所扩张的生产力，非现在国家的界限内所能包容；因为国家的界限内范围太狭，不足供他的生产力的发展，所以大家才要靠着战争，打破这种界限，要想合全球水陆各地成一经济组织，使各部分互相联结。……这种战胜国，将因此次战争，由一个强国的地位进而为世界大帝国。”（《Bolshevism的胜利》）

在此基础上，李大钊指出，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结束，则是帝国主义国内民族矛盾与阶级矛盾互相转化的结果，是俄国、德国工人阶级觉醒并发动革命的结果。他说：“俄、德等国的劳工社会，首先看破他们的野心，不惜在大战的时候，起了社会革命，防遏这资本家政府的战

争。……这亘古未有的大战，就是这样告终。这新纪元的世界改造，就是这样开始。资本主义就是这样失败，劳工主义就是这样战胜。”（《庶民的胜利》）他进一步指出，大战的结束，并不是帝国主义武力之间的胜利，不是德国被“协约国”的武力所打败，而是德国军国主义被国内工人阶级的社会主义所打败：“原来这次战局终结的真因，不是联合国的兵力战胜德国的兵力，乃是德国的社会主义战胜德国的军国主义。不是德国的国民降服在联合国武力的面前，乃是德国的皇帝、军阀、军国主义降服在世界新潮流的面前。”（《Bolshevism的胜利》）

俄国、德国革命浪潮冲击着世界，在世界各国的国内都发生了争自由、民主而反专制的革命斗争，争取自由和民主将成为世界性的潮流。李大钊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与结束，俄国和德国等国革命的爆发与革命思潮的传播中，敏锐地意识到整个人类社会历史即将发生大变革的征兆。他说：

人类的历史，是共同心理表现的记录。一个人心的变动，是全世界人心变动的征几。一个事件的发生，是世界风云发生的先兆。一七八九年的法国革命，是十九世纪中各国革命的先声。一九一七年的俄国革命，是二十世纪中世界革命的先声。（《庶民的胜利》）

又说：

一七八九年法兰西的革命，不独是法兰西人心变动的表征，实是十九世纪全世界人类普遍心理变动的表征。一九一七年俄罗斯的革命，不独是俄罗斯人心变动的显兆，实是二十世纪全世界人类普遍心理变动的显兆。俄国的革命，不过是使天下惊秋的一片桐叶罢了。（《Bolshevism的胜利》）

表面上看，李大钊在这里论述的是世界大战，是中国之外发生的事情，实际上，他内心时时思考和关心的是中国的社会现实。他借评述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和结束的原因、大战的性质和大战的后果，一方面批评国内各派人士对它的误解与曲解，另一方面则是指出现代化是世界化的浪潮，将来的中国也将受到世界化的影响，受到俄、德革命思潮的影响：“俄国的革命，不过是世界革命中的一个，尚有无数的国民的革命将连续而起。”可以说，在当时的知识界和思想界，蔡元培、胡适、陈独秀、梁启超等领袖人物关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认识都未能达到如此高度，也未能如此深透。李大钊关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论述，将这次战争

的后果——世界化、俄国革命、马克思主义思想、社会主义文化都引进了中国，他的这些论述和思想深刻影响了陈独秀和五四新文化运动，使新文化运动上升到一个新台阶——开始了对世界“新思潮”的传播。

3. 与时俱进的品格，率先在中国传播马克思主义

李大钊出生的时候，古老的中国正缓慢地向近代社会转变。严重的民族危机使积弱的晚清政府在资本主义列强的野蛮侵略面前，已经遭受了多次重大失败和屈辱。由统治者上层所设计的所谓变法自强运动，正在进行。同时，一批新的社会成分和社会力量也正在这种新的历史条件下孕育和成长起来。这种新的社会力量登上历史舞台的主要代表，起先是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严复等维新志士；后来，则是以孙中山、黄兴、章太炎等人为代表的革命民主主义者。当李大钊开始了学习生活进入少年时代以后，以这些人为代表的企图挽救中国命运的斗争，正分别顽强地进行着。李大钊在寻找救国道路的探索过程中，首先受到了他们不同程度的启迪或影响。

然而，由于近代中国的剧烈变化，新旧更替远比以往任何时代都要剧烈和迅速。昨天的新人物，今天就会变成旧人物；今天的新思潮，明天又被认为是旧思潮。中国的先进分子，就是这样，在短短的 20 多年中，前进的历史把一代代英雄人物推到幕前来。

在近代中国，陈独秀、李大钊是继康梁、孙黄之后奋起的探索救中国真理的第三代人。从历史发展的趋势和潮流来看，代替康梁维新派而成为时代主潮的是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民主主义派，代替革命民主派而成为时代主潮的是中国共产党人。凡此，无不具有新旧交替、新陈代谢的含义，但几乎绝大多数的前一类成员不易实现向后者的转变。而李大钊短短的一生，与这三种历史主潮均密切相关并参与其中。当他青年时代初步登上历史舞台之时，首先是追随时与康梁一样信奉立宪思想的孙洪伊、汤化龙等领袖人物，在清末与他们一起参与立宪运动，在民初与他们一道拥护袁世凯；而当袁世凯开始实行专制统治尤其是称帝野心暴露以后，李大钊又追随孙洪伊参与反袁革命斗争。在革命的实践过程中，李大钊迅速成长起来，终于与自己曾经一度追随但后来仍继续依附和支持北洋军阀的领袖人物汤化龙毅然决然地断绝关系。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李大钊又受到世界社会主义革命思潮的影响，再一次跨过了其他人难以跨越的障碍，率先信仰和传播马克思主义。可以说，在近代中国，还没有第二个曾经信奉过民主主义思想的人，像李大钊那样率